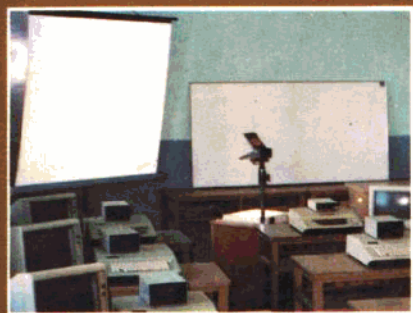


古校迈向21世纪



周年

陆拾肆佰叁



北京一中校史稿

王晋堂 主编

1644—1990

BEIJING No.1 MIDDLE SCHOOL

古 校 迈 向 21 世 纪

——北京一中校史稿

1644—1990

王晋堂 主编

华 艺 出 版 社

1990.10.

责任编辑 梁新萍
美术编辑 林心全
封面设计 吴 勇

古校迈向21世纪

——北京一中校史稿 主编 王晋堂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100010)

1202工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5 字数: 250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037-372-0/Z·129 定价: 50元

知我一中爱我一中振兴一中振兴中华

——高贤明

目 录

绿叶对根的情意——代前言	王晋堂 (1)
--------------------	---------

(一) 校史纲要

郑长风 (11)

一、从八旗官学到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	(13)
二、北平解放前的三十七年	(27)
三、建国后十七年北京一中的发展	(71)
四、十年浩劫和1976年后的北京一中	(93)

(二) 回忆母校

(109)

1. 老舍先生在京师公立一中任教	北京一中档案室供稿 (111)
2. 起步之前——老舍早年史料杂考之一	舒 乙 (112)
3. 并非传奇的故事——忆董鲁安先生	李寿朋 (115)
4. 驱宋运动和陈洪勋——校友赵鼎新访问记	郑长风 (118)
5. 一中，我投身革命从事文学的摇篮！ ——刘白羽回母校一席谈	王晋堂 (124)
6. 回忆母校 怀念校友 ——原北平市立一中学习纪实	36届校友安法孝 (127)
7. 怀念北平市一中母校的战友	36届校友安法孝 (136)
8. 贺母校校庆	36届校友杨大淳 (142)
9. 我的家庭与一中	郭正权 (142)
10. 我的父亲与一中	陈 光 (144)
11. 图书馆里是家乡——忆40年代的 一中图书馆	43届校友赵之简 (145)
12. 补偏救弊之风——忆母校一传统	45届校友周起凤 (147)
13. 日本人统治下的一中	45届校友周起凤 (148)
14. 食不裹腹的学子——母校生活片断	46届校友何敏文 (149)
15. 京昆萦耳爱国心——忆母校几事	48届校友李书耕 (149)
16. 区区小事犹铭心	48届校友刘仁龙 (151)
17. 难忘的岁月 火红的青春 ——1949~1952年北京一中	52届校友许镇方 (152)
18. 校风点滴	闵孝慈 (154)

19. “一中同学万岁”及其他	55届校友曲作家 (156)
20. 陈谋的画	55届校友陈谋 (157)
21. 今日全国劳模, 昔日“程疯子”	55届校友王希富 (162)
22. 我保存的学生时代纪念物	56届校友王德顺 (163)
23. 李寿朋老师当班主任的三个特点	56届校友王德顺 (165)
24. 经师易遇、人师难求——记李寿朋先生	56届校友孙昌武 (166)
25. 中学生活的珍贵记忆	56届校友杨耀泰 (167)
26. 沿着党指引的道路成长	57届校友韩青 (172)
27. 满庭芳——贺母校校庆	57届校友曾式强 (174)
28. 丰碑在默默耕耘中耸立——记金玉峰老师	57届校友曾文汉 (174)
29. 三十年体育回顾	陈宏光 (177)
30. 忆“向革命前辈——徐老学习”的主题班会	57届高二4班主任陈光 (182)
31. 欢迎您, 敬爱的徐老!	57届校友肖绪浪 (183)
32. 一张奖状和一组歌——我献给母校的 两件资料	57届校友于文斌 (184)
33. 艺术道路的基石——难忘的美术组	59届校友王明旨 (186)
34. 外宾访问我校	59届校友王嘉祥 (187)
35. 返母校有感	60届校友段春启 (188)
36. 一次满怀深情的聚会——为李寿朋老师 七旬祝寿	61届高三(1)班部分校友 (189)
37. 跟李寿松老师学习古汉语	61届高三(1)李尚英 (190)
38. “文革”中的一中及其他几事的回忆	69届校友汪绍良 (191)
39. 铭心致礼恩师金玉峰——我们的回忆	76年学友 赵永久 王云祥 (197)
40. 他激动不已地面对星空	朱志丹 (199)
41. 美术启蒙教育四十载——记北京一中美术教师金玉峰	董千里 (200)
42. 恩师李寿朋	86届校友王芳 (201)

(三) 人物志

1. 教工部分	(205)
2. 校友部分	(223)
3. 文艺界校友	(255)

4. 美术界校友 (263)
5. 体育界校友 (281)

(四) 校史资料 郑长风等 (289)

1. 经正书院是“源”还是“流”
——一中校史起始年代的有关资料 (291)
2. 略谈北京第一所八旗书院的始末 (297)
3. 北京一中校名、校址沿革 (302)
4. 建立中学以来北京一中历届校长 (308)
5. 建国后北京一中历年在校生人数 (310)
6. 自1912年以来北京一中历届毕业生人数 (312)
7. 解放后北京一中第一任校长 人民教育家
徐楚波事迹简介 (315)

绿叶对根的情意

——北京一中校史稿始末

(代前言)

一所学校的盛衰浮沉，与上万学子的喜怒哀乐息息相通，于学校、固然是无尚的福份；于学子，不能不说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当这部草率简陋的校史摆在读者面前的时候，这种相通，历历浮现在编纂者的脑际。

离开母校约六十年的林蒙（原名甘固），从重庆寄来数千字的资料。1926年他在一中是与李续刚同时的c·y（共青团）书记，如今年老离休。在远离首都千里之遥的山城，从报纸上看到了母校校庆启事。欣喜之情不能已，如烟往事重勾忆。他写的资料，为校史填补了重要一页。他似乎用尽全部气力，在信的结末写道：“我已八十岁，写不动了，祝母校昌盛！”

靳崇智，全国政协委员，邀了他当年的两位同窗李希圣和徐昭，一同来到母校。三位老人年龄共220多岁，登上教学楼，了解校庆筹备情况。他们所关心的是一中30年代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历史，又无限缅怀1934年被捕的校长沈国光，希望知道他的下落。对师长的怀念，是恋母校的渊源。正象六十年代校友、现任全国女足教练商瑞华所书的八个大字：“养我父母、育我一中”，热爱母校之情，出自一位足球健将之手，尤其表达了广大校友的呼声。

值得庆幸的是徐昭在学生时代拍摄的母校1936年1.29运动时的10余幅照片，历经50多年风雨，却保存完好。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中学生旅行团在北平市大中学生香山集会中的形影，其中多位后来成了建国的元勋，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当时集会的演出节目单中，赫然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使你仿佛置身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听到最危急时刻中华民族的呐喊；而当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两位，从照片中可以辨认出是著名演员崔巍和张瑞芳。这弥足珍贵的史料，似乎超出了一部校史的意义。

1990年4月12日，著名作家刘白羽来到阔别57年的母校。当他听说学校校长要去拜望他时，忙说：“我是一中的学生，应该是我去看望老师，哪能让老师看望学生。”他忆起自己在一中经历9·18事变走上街头宣传抗日、驱逐国民党校长的学潮以及他在一中图书馆——这是许多校友深切怀念的一片圣地——读到苏联革命小说《士敏土》时的情景：“一中是我投身革命、从事文学的摇篮。”他怀着敬意与深情说：“我们这一代跨越了创造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

两个时代，今天的新一代将建设祖国的新世纪——21世纪！”

1990年5月，在一中首届艺术节的闭幕式上，著名艺术家李法曾、韩善续、鲁继先、路裕华、段春启、曹建国、李增光等应邀到母校助兴。他们一一演出了自己的拿手节目，自然博得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而他们每个人在台上的一段独白，则远比他们的卓越的艺术表演更为感人。韩善续、北京人艺一级演员，以演出各种丑角和反派人物著称。他往台上一站，已然使学生们忍俊不住。只听他不紧不慢地说道：“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都是一中的学生，做为大家的同学，我不过比各位进一中早了一点。早得也不多，才40年。”在一片笑声中，他说：“现在我只赶上了艺术节的闭幕式，你们邀请我晚了点儿，如果下次学校举行美食节的时候，别忘了从开幕式就邀我来。”

曹建国，中国电影乐团民乐队队长，拿出一个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xūn)。他说：“我曾带着这种乐器到维也纳参加国际音乐节，原以为西方民族不一定能接受，出乎意料的是我演奏的一曲《黄鹂》使满场倾倒，我懂得了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我迄今当过两次民乐队长，一次是现在，一次是在一中。今天带来的埙是我自己制作的，我演出后把它留给母校，希望赠给学校下一任民乐队长。”李法曾等都谈到母校给他们的艺术生命奠了基，认为母校是他们走上艺术道路的摇篮。

一中在美术界的校友负盛名者尤多。在学校会议室里张挂着一中校友王培东、王温良、许继庄和王文芳、杨达林的赠画，这既是校友的赠画，也是母校的骄傲。母亲总是以儿子的成就为最大的幸福。正如今年5月2日在校友聚会时校园里张挂的一条话语所表达的：“春色葱茏日、桃李盛放时——母校的期盼。”

一个学生无论日后有多大名气，在母校面前依然是孩子。这就是在今年5月2日部分校友聚会时，当主持人邀请许嘉璐(54届校友，全国人大常委、北师大副校长)，强卫(68届校友，北京团市委书记)等已负盛名的校友到主席台就座时，他们执意不肯，他们说那应该是我们所尊敬的老师们的席位。是的，在主席台就座的平均年龄为七旬以上，有从20年代起直至50年代就在一中执教的范至甫、陶静波、王光兆、谢承仁、丁峥嵘、李世濂、张幼成、孙仲礼、卓惠亭、杨振藻、郑长风、黄自强、张时正、冯承英、汪兴序、闵孝慈、陈光等老师，还有深受大家爱戴的已故校长徐楚波的未亡人李桂芳(大家仍称她“李护士”)。这种聚会实属难得。老人们的出席显示了老校的老资格。而重振母校昔日的雄威，又是多少学子企盼的愿望！

几百年的兴衰，40年的风雨，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如一位饱经沧桑步履蹒跚的老人，披露着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的风尘，烙印着共和国曲折与沉重的足迹。1955年，似乎是一中建国的顶峰时期，它当年跻身于北京市教育质量最高的七所学校的行列，受到市政府的表彰。那一年高三甲班的全体同学都考入了第一志愿的大学。该班同学如今皆已鬓发花白，个别校友甚至英年早衰，但他们除了在“文革”中一度中断聚会外，坚持每年相聚一次。他们有的当了大学党委书记，有的当了局长，有的成了卓有建树的工程师、经济师、教授、艺术家、编辑，但不论地位高下，他们都是一中这一令人骄傲的集体中的一员，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一的凝聚力。

迄今健在的最老的校友是京剧界元老、著名剧作家翁偶虹，他是一中1923年的校友，并曾亲聆当时在一中执教的老舍先生的国文课，对老舍在课堂上演唱京剧，在讲解诸葛亮《出师表》时学着红极一时的名演员谭鑫培的念白“悔不听先帝之言，错用马谡，乃亮之罪也！”又有一次讲解骆宾王的文章时，老舍突然唱起昆曲《弹词》的情景记忆犹新。而迄今健在的最

老的师长当属刘秉哲先生。他1923年从北师大毕业后即到一中执教，任教务主任20余年，直到1948年离开一中。当我们到后海沿一所别致的四合院拜访这位老人时，这位年已92岁的老人清癯精瘦，身体尚好，历数他在一中任教务主任时换届的十任校长。他解放后在北京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讲数学课，一直到“文革”前退休，北京市曾表彰过这位一生忠实于教育事业的老教师。遗憾的是，他所获得的珍贵奖状、证书已在“文革”中失毁。

解放后和徐楚波校长一起接管一中的张幼成、李世濂同志还时时关心着一中。张幼成在离开一中后任东城区教育局局长，东城区副区长、东城区政协主席，他在写给一中的简历中写道：“我在一中虽然只工作了12年，但我感到自己始终没有离开过一中，我是属于一中的。”张幼成和一中的原领导刘启民、黄自强、项秀荣等以及齐续喆都为了一中的校庆的筹备提出了具体的宝贵的意见，在确定校史起始年代和校庆活动计划上，提出了决策性意见。

金玉峰老师，到1987年他已在中学美术界执教45年，而今以退休教师的身份，仍然奔波于美术教育界，除了在工艺美术职业高中兼职、在工艺美院附中任名誉校长，还是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在我们撰写校史即将完稿时，他匆匆跑来，告知我一中的校友王明旨已经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其兴奋欣喜之情不亚于自家遇到了特大喜讯。这也是绿叶对根的情意——教师从来都是一片绿叶，育人的事业是他们生命之根。这使我想起我和他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82年，京西潭拓寺下一所中学校（似乎是南辛房中学），其时我是另一所学校的教导主任，带着学生来此夏令营，适逢金老师带着一中美术组来画画——他的寒暑假多数是这样度过的，而他的学生就是在祖国的如画江山的怀抱里、在老师对艺术的执着不悔的深情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学生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当是一生的幸事，而学生的成就——他几十年之内培养出百余名专业美术工作者，为他的教育生涯立下了一座感人的丰碑。

每所学校都重视自己的校园文化。我曾在上海的一些学校中看到他们的校园雕塑：古今中外的名人荟萃于美丽的园林和楼道走廊。这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从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到牛顿、爱迪生、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文化名人是人类共有的，他们可以出现在上海也可以出现在北京，他们可以塑身于中国也可以塑身于美国。但一所学校应该有一所学校的特色。我们曾想在一中的校园里塑曹雪芹象——他曾在一中校史中宗室觉罗八旗学堂的前身——右翼宗学中做过教习，也想塑一座老舍像——他于20年代曾在一中作国文教员，兼教修身与音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塑徐楚波像，在这位中国著名教育家于1982年去世时，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献了花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罗常培、董鲁安、郑天挺以至每一位曾把自己的心血浇灌在这里的值得尊敬的老师们树碑立传？为每一位值得一中历届学生学习的校友们留名纪念？比如说，留下从徐楚波到金玉峰，从齐燕铭、刘白羽到许嘉璐、王希富（55届校友，全国劳动模范、十三大代表）的业绩？这些师友应当在一中校史中占有一页。他们是母校的光荣，是母校的骄傲。

一中现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是共建单位。今年7月，总政群工部长祝庭勋（现已调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与一中校长座谈时说：“五十多年前，一中为我们的培养了一位文化部长（按：刘白羽曾任总政文化部长），五十年后，希望一中将为我们培养更多出色的人才。”在一定意义上说，一所学校的社会价值就是它为社会输送的人才。

一中校友的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吃皇粮”的。我们曾希冀校友中能有些巨贾富商为一中的振兴解囊助力，以解一中发展的燃眉之急，看来是有些令人失望。我们想塑一些名人象的愿望尚无法付诸实施——比如在一中校园中塑老舍雕象已经得到胡洁清和舒乙的首

肯，却因资金难筹而只能把这像塑在我的心里。但仍有许多校友不吝阮囊羞涩，慷慨给予母校赞助。开赞助之先的一位是60年代校友于锡昭，他是地坛公园的花工，也是一位已取得不少成就的花卉艺术家，曾获全国和市级奖励，在他携作品赴法国参展之前送来赞助款。另一位是40年代的校友林风（原名王孟龙），他已离休，几次跑到学校来，当接到学校给校友的信后第二天就跑到学校来表示自己的心意。按照我们的“量力而行，不勉其难，凡有资赞，载入校史，资助多者，镌石志之”的捐款原则，截止到1990年7月底，在赞助名单上还有沈国华、刘仁龙、韩林山、张宏炎、赵连元、韩威、何敏文、于尔源、方凌云、申勇、汪绍良、王琦、王庆绥、张志刚、周起风等名字。

还有送上自己珍存的日记、奖状、证书、校徽、照片资料的各位校友，他们以各种形式表达着对母校的挚爱，希望能为母校做点实事。使许多校友扼腕不已的是一中“文革”后的不景气，他们寻根于母校一中，却不复见旧时的校门、旧日的古槐，旧时的图书馆、旧日的天桥。看见在一中辽阔操场上矗起的两栋区教工宿舍楼，许多校友痛心疾首说一中的足球完了！而一中曾为足球专业队输送过不少“国脚”呢！看到过去属于一中地界的郎家胡同西口南侧已割给某工厂盖了宿舍楼，也颇有不平者，大有收复失地的情绪。他们不知道这笔糊涂账要跟谁去算？这似乎不仅是一中的悲剧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剧。30年代的校友们听说一中连区重点中学都不是时，简直觉得难以置信。校友们寄给母校几百封来信中，几乎异口同声地疾呼希望母校尽快振兴，恢复往日雄风！这些感人的插曲，直使我们在编纂校史稿时想不出别的题目，油然而生的是一首通俗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的歌词，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依着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情牵着你，
我是一片绿叶，
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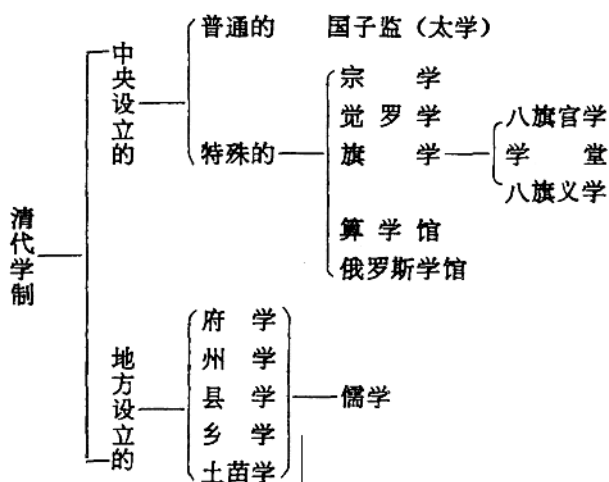
“一中校史是半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这是为撰写校史纲要付出辛苦劳动的退休老教师郑长风的一句话。

一所中学的校史，能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沿革的一个缩影，使这部校史具有了教育史的意义。

上溯一中校史，从1949年4月11日接管后为北京市第一中学。其前身为1912年民国之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命名的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其前身为宗室觉罗八旗学堂（1902为中小学堂，1904为高等学堂）。

那么，宗室觉罗八旗学堂的前身又在哪呢？我们按照寻觅黄河源头的方法可以找到其前身的三个分叉：即宗学、觉罗学和八旗官学。

翻开中国教育史，关于清代学制，有图示如下：



参见毛礼锐著《中国教育简史》
1984年教育科学出版社
及顾树森编《中国历代学制》
198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由此可以看出,做为一中前身的宗室觉罗八旗学堂应是三校合一而成,而非单自经正书院而来,1894年(光绪20年)所建立的经正书院是八旗官学发展的流而非源。为此,在编撰校史过程中,我们专们核查了十余件资料,且冠以“经正书院是‘源’还是‘流’”的题目,以正本清源,说明经正书院只是一中校史中发展的一个插页,其发源自八旗官学,其发展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经正书院”的“经正”二字是使使得正之意,亦即是对康梁维新“离经叛道”的反动,是顽固维护即将土崩瓦解的旧学体系的产物。但清朝遗老徐桐建立此院,并没能阻挡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实践证明会骑马射箭的满文翻译和“科举”人才若在200年前清朝入关时还有存在的意义的话,200年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事实已彻底暴露了清政府腐败和其教育体制的落后,徐桐提出的经书为“本中之本”以“正经”的道路,其实是一条死胡同。经正书院的碑石一直延留至今,且经历“文革”浩劫之后尚得以幸存,成为一中校史的一件珍贵文物;但经正书院自身,却只存在了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成了一现的昙花。

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由古代学校向现代学校——以分班授课制为标志——的一页,(这一变革比西方晚了270年),也可在一中校史中找到佐证。

1902年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以及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都在宗室觉罗八旗学堂得到体现,而制定这两个章程的张百熙,则做了管理宗室觉罗八旗学堂的事务大臣,学校的一切具体工作均由张百熙负责筹办。翻一翻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在提及杭州府中学堂(1901)、长沙明德学堂(1903)、天津敬业学堂(1904)等例时,独忽略了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1902),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的阙漏。而在1898年清朝总理衙门筹办京师大学堂时曾规定:“于大学堂中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其所寓即宗室觉罗八旗学堂,这在1933年12月7日北大建校35周年时《国立北京大学志》编纂处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中,在《清朝续文献通考》106卷学校13中所转印宣统元年(1909年)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都有明文记载;1902年到1903年,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隶属于京师大学堂。一中的校史,或许在这一方面会给研究近现代教育史的专家们一些有益的资料。

从古代学制到现代学制,从清代旗学到民国的平民学校——民国初1912年蔡元培改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五族皆可收入”),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每一个重大转折,在一中校史中都有反映。这足以使一中校史具有教育史的意义,成为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必备参考资料。

而一中于1926年由李大钊亲自建立共青团——可参见《李大钊传》大事年表。30年代建立共产党组织——党组织的多数负责人尚健在,虽多已离休但都曾经在国家机关或军队任要职。一中在“五四”运动中,在“3·18”惨案中,在“12·9”运动中以至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校友们都留下了爱国、革命、要求进步、反抗黑暗势力的光辉斗争业绩。牺牲在雨花台的一中校友陈鸿勋烈士是永垂不朽的,为共和国建立而抛洒头颅热血的革命志士的精神是永存的。50年代,一中的学子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奔赴祖国的各条战线,奔赴留苏深造之路,奔赴各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以造成建国之才成为国家的栋梁。一中又是北京市招收华侨学生最多的学校之一。一中曾受到北京市的各种奖励与表彰:曾获得市教育局颁发的勤工俭学特别奖;因贯彻“五四”决定成绩卓著成为高考升学考试中全市七所平均成绩及格校之一而受到市人大的表彰,等等。一中在北京市教育界享有着光荣的一席。

毋庸讳言的是，一中的教育质量曾有过起伏徘徊甚至退坡，因素是复杂的，评说也为时尚早。“文革”浩劫中一中又成了重灾区。80年代初，一中以分快中慢班受到当时教育部的重视——蒋南翔曾亲临视察并对此予以肯定，但它却在定重点校时榜上无名，从此除了教师队伍质量随自然减员等各种因素的削减外，生源已是在重点校筛选之后的“二茬生”，而升学率不能在市区名列前茅时，社会声望的下降又使它难以收到高分学生，加上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因素，一中几乎陷入了一个非良性循环的怪圈，居于东城区第二类学校（老校）的中游甚至偏后的位置——划分这个位置的标准首先是升学率。正是在这个时刻，东城区政府，区教育局采取了一个重要决策，于1988年底，把一中定为区实验学校，并委派在中学管理工作上有40年工作经验的东城区教研科研中心主任高贤明担任一中校长。一中开始走上实验改革的道路。1990年5月13日，市教育局陶西平等三位局长、五位处长来一中现场办公，讨论落实一中整体改革的方案，揭开了一中校史上新的一页——实行中小学十二年制的综合教育体系实验。

人们期望教育实验将使这所老校焕发青春。

这确是一所老校，从清顺治初（1644年）至今（1990年）已有346年的历史，但它又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做为实验校还刚刚起步。对于已近退休年龄的高贤明是老兵新传，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中则是老校新花。

出路在于改革。尽管校友们对一中走实验之路的得失还有些摸不准，但一中的命运，确是大家所关注的。校友们拭目以待，看着一中现领导怎样开动这艘古老的航船，迎向21世纪的风浪。

纵观一中校史，从多个角度都有意义：既具有近现代教育史的意义，又具有近现代通史的意义；既具有学校史的意义，又具有北京史的意义。然而一旦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部校史时，又使我们深感惭愧，这部校史还是如此肤浅，尚远不足以充分展示它的历史价值。这一方面是史料不足，编撰者下的功夫还不够，又一方面也限于我们的史学素养还不够高，开掘资料也不充分。因此，这册一中校史还只是一个初稿和粗稿。高贤明提出可以有一门“一中学”，还希望广大校友和关心一中史料的专家们探讨研究，以期有所突破。

一中史料还不够丰富，对于现有的一些内容也还有争议。如果说谈古尚易，论今可就难了——因此一中校史旗学部分还好写，不论是旧旗学还是新旗学，当事人均已做古，任由后人评说。但论今，则不易；倘说一中的成就，固然大家脸上增光，倘说一中办得不够景气的教训——其实很多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致，但仍不免有失“公允”。今天推出的稿子，能不能为大家，为一中历任领导、师长、校友接受，尚不得而知。原想先拟出一份油印稿，广泛征得各方面意见，充分讨论后定稿，然后付梓，这样做理想的很，但一是颇费时日，二是一旦有争议——哪怕是细枝末节，也可能造成卡壳，校史又将搁浅，而且很可能是无限期的搁浅。因此在现届校行政会上议定，校史稿撰后直接付梓，印出后可由各位校友商榷，各种不同意见可在而后以校刊或适当时候的出版物上，譬如350年校庆——1994年的纪念物上刊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争论应发扬民主，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兼容并包，求同存异。这样做的风险是难免这里那里失误，但它的最大的优点是，总算有了一个成品——哪怕是极不成熟的成品，总比什么也搞不出，什么也搞不成不知强多少倍。不知这种偏执的意见是否可为各位师友校友赞同，这或许是这部校史要经受的第一个考验。

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校友和关心一中的读者们，能挑出这本小册子中的各种毛病，这绝非谦词或套话，而是使一中校史臻于完善所必须。

谈到编撰校史的意义，它对校友固然是青少年宝贵年华的印记，对于后来的学生，则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爱国是具体的，它应该和爱家乡爱母校有着天然的联系。一中的历史，跨越了中国近几百年的各次重大事变。从清的人关到清的灭亡，列强入侵、维新改良、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建国后各次重大政治运动，一中就是从这样的曲折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跋涉过来的。现在奉献出来的校史在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的某些方面有反映，在另一些方面反映不足，在某些方面还是空白。封建伦理、封建礼教、八股文风等等，在一中教育上固然有反映，西学东渐，不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论，以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在一中的校史中也有相应的反映。一中校史应该成为一部民族文化传统史，一部革命传统史，起到“以史为镜”的作用，并可以做为每一位一中而后入学学生的教材。一中应该有一门特别的选修课或必修课——《北京一中校史》，这将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设想，这或可以成为一中教育实验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学校中提出“知我一中、爱我一中、振兴一中、振兴中华”的口号那时将得到落实。请各位校友和各界读者为实现这一有价值的目标出力、出策——小而言之是为一中，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三

这部校史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校史纲要”，希望给一中校史划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一部分内容是在80年代由李寿朋、郑长风、闵孝慈老师组成的校史编写组的工作基础上，由郑长风老师执笔，并在今年3月由校庆组委会委托郑长风老师撰定的。但是郑长风老师自1644年写到1982年，我们请杨毅竹提供了1982年到1988年的资料，1988年以后由王晋堂撰写，全部稿件由王晋堂统订。这样说明，是为了说明文责自负的分野。应该说这还是一个极粗略的草稿，如前所述，尤其是对解放后一部分，写得太笼统肤浅，旗学部分也还不够丰满。第二部分是“回忆母校”。收集了各届校友的有关的校史回忆资料计42篇，多是由校友撰写寄来稍加编纂而成，虽几乎贯通了校史的全过程，但收稿的仓促导致了这一部分尚不够细致，许多拥有珍贵史料的校友可能还无暇顾及提供更详尽的材料。或许看了这册校史后会引起校友们的联想，还希望随时能撰出新的材料寄给我们以待尔后补阙，使校史资料日趋完善。第三部分是“人物志”，我们的初衷是能给每一位师长和校友都做一个小传——当然这也是一种颇天真的理想，似乎也不尽必要，但今天集成的这些内容，尚远远不够全面，还请广大校友鉴谅为怀，并且希望能够为母校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包括本人的或他人的。学校是育人的场所。对辛勤的园丁——各届师长当树碑，对所育良才——校友的成就也应立传。一中的众多师友都是教育界的中坚，为民族为国家培养人才不遗余力，一中众多的校友都是国家建设的栋梁，为民族为国家在各个岗位上放热发光。他们是一中校史中极宝贵的素材。第四部分是一中“校史资料”，这一部分主要是提供一些有关史料使对校史的研究深入并继续深入。本应附加第五部分——“校友录”，我们已经找到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1990年全部校友名单，也找到了清代宗室觉罗八旗学堂部分学子的名单，应该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幸存物——

因为经历了“文革”对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什么东西被毁弃了都是不足奇怪的，由于名册收录人数近万，所以只有另册印出，且暂时截止到70届校友为止。一中“校友录”将另册同时出版，以饯各位校友怀念同窗之情。

在说到一中校史始末时，难以一一详尽，但在做了贡献的很多人中有三位我想是不得不书上一笔的。

一位是现任校长高贤明。他上任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学校推出的实验项目之多、战线之长使人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一中多年没有搞校庆，为振兴一中事，是他提出的于1990年搞校庆的建议，并在校庆筹备的各项工作上、确定校史的起始年代上和校史编撰方面提出了有魄力有见识的意见。没有他的决心与经验，一中的校庆可能还要搁些时日，而许多位年事很高的师友校友很可能就失去了一睹母校校庆的机会，并且将给校史资料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一所最古老学校的校庆活动能代表的历史意义，也许而后才会逐渐表现出来，校友们对这一决策的高明将会愈来愈有深刻的体会。他是校庆组委会当之无愧的负责人。

另一位是郑长风老师。郑长风老师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经系，1951年到北京一中工作，在一中执教政治语文等科目达38年，并在50年代担任过“马特洛索夫班”班主任。1982年底起由学校聘任编写一中校史。从此他和闵孝慈老师开始了钻清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的故纸堆，又拖了一条跛腿或挤公共汽车或安步当车，采访了赵鼎新、靳崇智等许多老校友，记录并整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往往是一出去就是一天，从他居住的宣武门外老墙根跑到北京农大，这个距离对于北京拥挤不堪的交通而言，颇非易事。他以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考据为撰写一中历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一切都是在毫无补贴报酬的情况下做的。他的夫人抱怨住房拥挤，学校对他从政治上到生活上关心不够，但他仍以无怨无悔的献身精神准时在5月下旬捧出了星夜兼程赶出的校史纲要文稿。历史对这位老教师也许不尽公平，但他却对历史负责，以对一中一往情深的挚爱报答了历史。

还有一位须要提及的是本书责任编辑梁新萍，这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教师，她在工作中的认真负责无私利他的精神在一中是公认的。从她接手本书之日起，她突然活跃起来，或穿梭于老校友的庭院书斋陋室间，或“电讯”或“书信”成了“热线”联络员。其效率之高往往令人吃惊，常常是我刚刚想到的事她已办妥了。应该说编成这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仍然投入了许多同志的劳动，但若问座中汗水谁最多，当首推小梁了。从今年3月以来，她在完成本职工作及许多额外工作之外，牺牲了中午、下班后、晚间许多休息时间，致使知此情的老师不得不向领导反映“用人别用得这么狠”了。7月中旬放暑假，恰值校史编辑工作的“冲刺阶段”，她就成了一个取消了假期的正常甚至超常的上班人。在三伏的酷暑中挥汗，时有忙得顾不上吃饭的时候。她却干得乐得其所、干得颇有创造性。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的辛劳，也就没有这本校史的及时面世。许多校友认识她，还有很多校友不认识她。尽管她百般阻挠，我想我仍然应该坚持为“无名者”做一个剪影。我想这不只是为她邀功，也是向校友表明一中还有一批象她这样的无私奉献的园丁——一中是有希望的！

这三位值得钦佩的人，一位是年近花甲不知老之将至的“老马”（高贤明1930年生，属马），一位是年过花甲不顾自身残疾而终日奔波考据的郑长风老师，一位是经常带着微笑的柔弱女性梁新萍。或如久经风霜的老槐，或如古城墙头的酸枣树，或如路边地头的一棵小草，都是索取于自然甚少，顽强地植根于不一定肥沃的大地，却奉献着自己的全部能量。他们是“一中精神”的缩影，他们的共同风格是奉献、无私的奉献！

四

最后，我想还应向广大校友和读者交待一下我的工作。

我似乎是属于一中校友中“校友龄”最年轻的一个——1989年6月才调入一中工作，应高贤明校长之聘，于该年9月任副校长，分管学校教育实验工作，后又受命负责筹备校庆活动，因此，就要负责一中校史的主编任务。

接触到这样一所老校的史料，每每使我兴奋不已，我为它的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所感奋，应该说是対一中满怀敬意地投入了校史编纂工作。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广大校友的支持，受到高校长和各位师长的信任和委托，得到李寿朋、郑长风、闵孝慈等老师的合作，又有了梁新萍、王淑英、步妍彬等老师以及特邀的林心全同志做得力助手，使这项应该说比较繁重复杂的工作做得较为顺利和有效率。

遗憾的是，我没有更多时间去更深入地搜集史料、研究有关理论，把一中校史搞得更充分更深入。这一遗憾，只好待将来有机会或由其他老师弥补了。

为这本校史的成书，应向广大校友致谢，特别是向张幼成、刘启民、黄自强、项秀荣及齐续喧同志，

向校长高贤明以及杨毅竹、王平生、霍仲武等同志，

向李寿朋、郑长风、闵孝慈等老师，

向梁新萍、王淑英、步妍彬、林心全等合作者，

向1202工厂和华艺出版社，向一切帮助过我们支持过我们的朋友致谢。

本书各撰稿人已在每篇之前署名，责任编辑为梁新萍，美术编辑为林心全（特邀），封面设计为吴勇（特邀）。全书由我统稿。

仅将此书献给一中广大校友和各界关心一中的同仁。

回想1989年9月，我初入一中时正值京华金秋，一中校园内菊花初放，悦目沁心。触景生情，我遂以咏菊为题，赠诗于友人。兹不揣浅陋，引来一表心意兼谢各位校友和读者，并作为这篇代前言的结束吧！

飒飒金甲寄秋兴
花重京城第一中
香冷不期出篱外
蕊寒何碍挽长缨
蓬转九寻当归根
锋试千回可论功
既幸知人适斯土
再涂桃李染春风

王晋堂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于北京一中